

当代陕西作家与 秦地传统文化研究

——以柳青、陈忠实和贾平凹为中心

刘宁◎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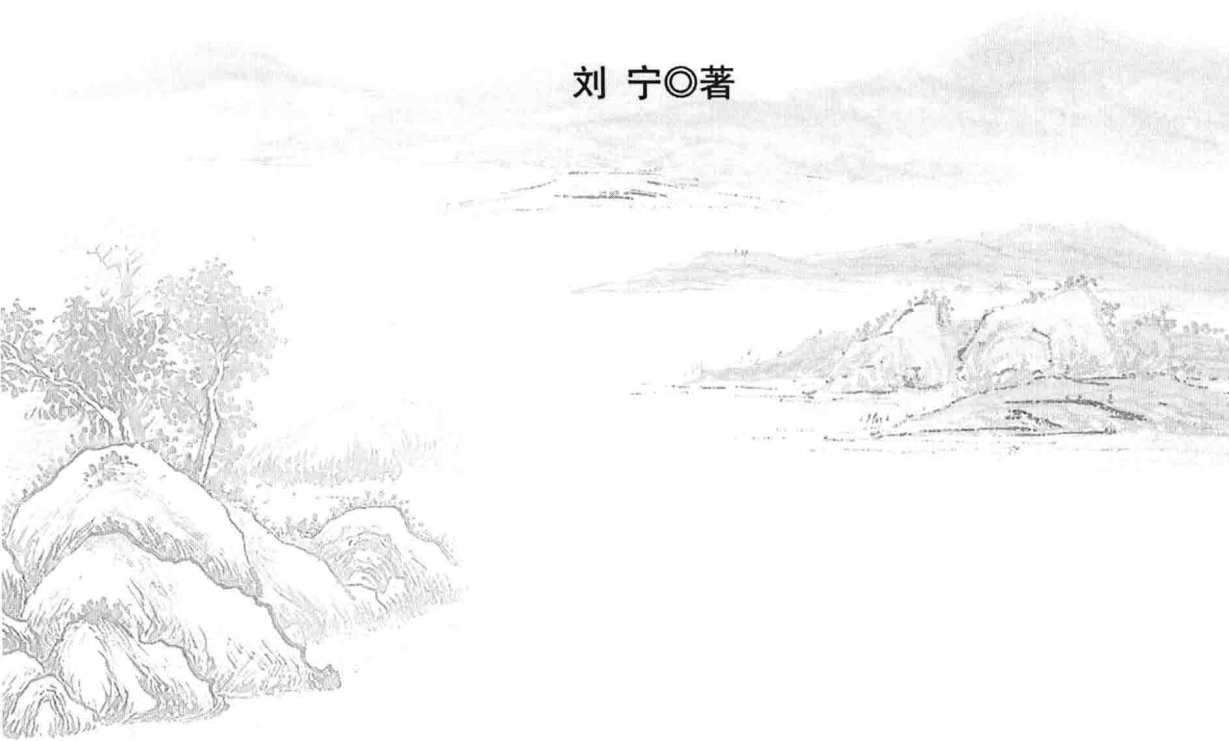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当代陕西作家与 秦地传统文化研究

——以柳青、陈忠实和贾平凹为中心

刘宁◎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陕西作家与秦地传统文化研究:以柳青、陈忠实和贾平凹为中心/刘宁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161-3639-3

I. ①当… II. ①刘…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120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孙 依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戴 莹

出 版

社 址 北京城楼内大街甲 6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9.25

插 页 2

字 数 309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陕西人文社会科学文库



序 言

近些年来，我时常会感慨这样一件事情：学位教育特别是博士生培养在古老而又现代的中国总算有点像模像样了！如今的中国在社会上或高校中，很多人也确实都比较重视学位教育了，考研考博成为社会“热点”之一，这显然是很好的事情。由此，我们看到了人口大国向人才大国转化的希望，可以说，在追求知识特别是学科知识创新方面，以及积极建构相应的梯级教育结构等方面，中国在不断地努力着、发展着，其国际上的影响也在逐步地增大。我作为有近30年高校教龄和10多年从事研究生教育管理的“过来人”，对此颇有感触也是自然的。但同时，对存在的诸多问题自然也看得比较清楚，出于关切，还曾专门研究过相关问题，如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的关系、文科研究生学术环境的优化、现当代文学学科与研究生教育等，发表过多篇相关论文。但这些文章很少是针对研究生的言说，而多是针对大环境大社会大教育的分析和建言。

作为一名导师，平时对研究生的言说自然也是不会少的，方式可多样，但基本主题似乎就只是一个——劝学。有一次我和多位导师一起，联合对全校新近入学的博士研究生进行了一场公开的“劝学”，我借机把平时散文化的劝学之语梳理为“顺口溜”，说得雅一点便是所谓韵语或打油诗了，云：

英雄不问来时路，
勤能补拙多读书；
师生联袂创奇迹，
学术生命造万福。

如果要追加一个题目，那就是《劝学·赠博士生》吧。我当时在具体解释中，主要结合的例子是本校已经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三位博士生的事迹。这四句话看上去非常平易，其实真的包含了“朴素的真理”以及我的许多观察、思考及感悟。

所谓“英雄不问来时路”，是讲入学的博士生不管原来的学历如何，入学之日则都来到了一个新的起跑线，要有“平等”意识，要有“同学”相惜相助的情谊，也要有“英雄”或“英雌”意识，自信、自强，让自己真正强大起来，在学术领域争得一席之地。我尤其觉得，在看待人的能力、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发展潜力方面是不可以简单地用学历这样的东西下结论的。特别是人文学科专业的研究人才，常常出身低微、贫寒，人生道路坎坷崎岖，却经验丰富，体验深刻，不怕吃苦，拼劲十足，还懂得珍惜，惜时感恩，协调能力强，因此发展前景相当广阔。相反，一顺百顺的学子，即使博士毕业了还终究是个“学生娃”。不幸的是，如今的人事管理部门常常纠缠于第一学历以及学位的“洋”与“土”等，虽然不能说毫无道理，但据此“一刀切”却制造了新的“出身论”或“血统论”，“扼杀人才”于无形之中，其中的惨痛教训确实应当吸取。

所谓“勤能补拙多读书”，诚是确切、殷切的劝学之语。说的是能考上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的人，智商都应在中等以上，但那些最终能脱颖而出者主要靠的不是天赋而是后天的拼搏。尤其是觉得自己有点笨拙的人，更要将“勤能补拙”贯彻到底，以惊人的勤奋投入到读书学习过程之中，不敢懈怠，奋斗不已，肯定是可以大有收获的。我曾反复给学生说过，“最好的老师是‘黑白先生’”，其含义就是要多向好书求学问道，因为书籍大多是“结晶物”，多读多受益，善读多创获，不要迷信那容易流于一般化的“上课”。

所谓“师生联袂创奇迹”，意在强调建构默契、有为的师生关系，教学相长，共同奋斗，便可以联手取得学术佳绩，创造学术奇迹。通常在理工科，导师和研究生是必然的“合作”关系，导师甚至是精于经营和管理的“老板”，成果多以团队名义发表。窃以为人文社会学科也要适度学习这样的合作精神，导师要放下身段，尽心尽力指导学生，甚至通过合作研究具体课题，切实引导学生，而学生也要主动创造合作的机会，主动求教

和提交专业论文。事实上，那些名副其实的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无疑都是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从酝酿选题、正式开题，到写作过程和答辩环节，期间必然要有很多师生之间的认真交流和深度讨论。即使是发表相关论文和申报各种荣誉，也需要师生的真诚合作。

所谓“学术生命造万福”，首先说的是，博士生要将“学术”视为“生命”，要将“学术”当成自己的人生信仰。因为博士群体是人类中的“另类”，是极少数，是“高端教育”或“精英教育”的产物。这是一群将“学术”视为生命本体有机组成部分的“能人”，“学术”从某种意义上已被他们“内化”为自己坚定的人生信仰。唯其如此，才能自动、主动地从事学术研究，一往情深，无怨无悔，在“新国学”崛起、中华民族崛起的大时代，倾力而为就可以作出重要的贡献。其次，由此也便可以“自我实现”，达成人生的一个主要奋斗目标。对于博士群体而言，这是一批既要“立己”、“立人”，也要“立国”、“立家”的“民族脊梁”，要有事业上的成功，要有造福人民的抱负和使命感。当然，也要由此为自己和亲人带来更多的福祉，顾全更为完满的人生。

在我心目中，能够将这四句话落到实处的研究生就是真正优秀的研究生。那些荣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博士生，大抵都是如此。虽然刘宁的博士学位论文没有申报全国优博论文（因为她在读期间已经评上副教授了，故按文件有关规定不能参与申报），但确实具有扎实的学术功底和相当的竞争实力。她在读期间就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名刊上独立发表了多篇与博士学位论文直接关联的论文。在外审和答辩中，也都获得了“优秀”等级的评价。如此说来，不能参加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确实有点遗憾。但如今能够进一步充实、完善，通过正式出版以增益学术文化，也毕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在我看来，刘宁是一位外表比较时尚但内心拥有浓烈的古典情怀的人，平时喜好唐诗宋词及古典戏曲，经常撰写诗词抒发胸臆，这在搞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中是罕见的，同时，她对文艺理论也有浓厚的兴趣，曾撰写过多篇文艺学及美学方面的文章，有了这样的底子来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真的是具有明显的优势，由此也才敢于挑战学术前沿的某些学术难题。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当代陕西作家与秦地传统文化研究》，就是这

种敢于挑战、勤于探索的结果。她于2008年曾参加一次以“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提交了论文《贾平凹与秦汉文化初探》并在会上发了言，还申报了“211工程”建设项目“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课题的子课题，结果以《西安文学与长安文化》为题获得立项。在此基础上，通过讨论和开题程序，确立了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为了完成学位论文的撰写，刘宁除了在校内图书馆、资料室发掘资料，还不辞辛劳，根据作家介绍和作品文本提供的线索，奔波在关中、陕南等地，拜访相关人员或学者，走上了成就陈忠实的白鹿原，踏进了养育贾平凹的丹凤故里，广泛搜集书面的和民间的各种相关资料，亦曾到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去查阅资料，下了很多硬功夫，付出了很多心力，这才拿出了这样一篇颇有分量的博士学位论文。

如今，在文学研究中能如此吃苦、执着求索的研究生确实并不多，能够将当代作家进行如此“实证”研究或“文化考古”的似乎更为少见。由此，刘宁通过个案的具体分析，集中探讨了三个方面的大问题：其一，秦地传统文化怎样激活了当代陕西作家的文学意识和文学想象？其二，当代陕西作家与秦地传统文化在哪些层面上获得精神上的契合？其三，作家在借鉴西方的优秀文化成果之际，以自我生命体验，创造了哪些属于自己时代的新文化？由此可以见出刘宁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不仅如此，她还充分发挥自己古典文化知识面宽、理论水平较高的优势，结合具体作家作品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相当深入的阐释。而就其从“地域文化群落”研究视角进行当代文学研究而言，则有利于消除诸多“本质先于存在”的局限或误导，更好地还原文学错落有机的原生态。同时，将历史地理学的一些研究方法纳入文学研究视域，这种有意味的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它试图改变过去地域文学平面化研究的状态，尤其是从作家生活空间的转移，地域文化的累积分层中概括出作家们创作风格的多样性，加强和拓展了“人地关系”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因有学位论文及充实后的文本存在，这里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相信读者会自有明鉴的。

当然，每个重要的研究课题都具有开放性，刘宁选择的这个地域性文学的文化研究课题本身，也有其限定的论域及其固有的局限性。地域性知识如何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比较和分析，这本身也许就是个世界级的难题，

世间许多分歧和纷争也由此而起。刘宁关于区域文学和文化的探索还在继续，也应该再接再厉，登高望远，进行更为广阔而又深入的探索。幸运的是，她在2013年成功申报了国家课题《当代陕西作家与农民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这就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希望刘宁能够克服各种现实困难，坚持自己矢志从事的科研工作，取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科研成果。

是为序。

李继凯

2013年8月16日

目 录

序言	(1)
绪论	(1)
第一章 秦地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	(16)
第一节 秦地传统文化的现代存在样态	(16)
第二节 秦地传统文化与 20 世纪的现代化挑战	(30)
第二章 当代陕西作家与秦地传统文化	(47)
第一节 当代陕西作家创作的文化意识	(47)
第二节 当代陕西作家与秦地传统文化的契合点	(59)
第三节 陕西作家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72)
第三章 柳青与民族化形式	(82)
第一节 早期的民族化书写与黄土地上的文化寻根	(82)
第二节 从关中传统村社向社会主义农村转变	(96)
第三节 民族化史诗结构探索与史传传统	(110)
第四节 以秦地方言写作	(128)
第四章 陈忠实与关学	(142)
第一节 创作心理嬗变	(142)
第二节 关中文化论	(152)
第三节 《吕氏乡约》与《白鹿原》	(165)
第四节 末代关中大儒的式微与儒教文化之危机	(179)

第五章 贾平凹与楚汉文化	(194)
第一节 商山丹水	(194)
第二节 西安这座城	(208)
第三节 南北文化的融汇与时代旋涡之心灵裂变	(223)
第四节 黍离麦秀之悲与颓废书写	(231)
第五节 鬼神巫术信仰与诡异的文学想象	(242)
第六节 走向怪诞深处与魅性审美	(253)
结束语	(265)
附录一 两种现实主义的论争	
——柳青研究六十年的回顾与思考	(271)
附录二	(282)
主要参考文献	(289)
后记	(296)

绪 论

一 当代陕西作家群的崛起与发展

当今陕西省行政区域，简称“秦”，最早称“雍”，《尚书·禹贡》记载：“黑水、西河惟雍州，厥贡惟球、琳、琅玕，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① 后来又称丰、镐，《三辅黄图》曰：“禹贡九州，舜置十二牧，雍其一也。古丰、镐之地，平王东迁，以岐、丰之地赐秦襄公，至孝公始都咸阳。”^② 秦这个名称，按《史记·秦本纪》云：“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赐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尔后嗣将大出。’”^③ 大费因帮助舜驯服鸟兽有功，所以赐姓嬴氏。后来，一位名叫造父的秦人御手，曾为周缪王驾车，长驱归周，平定了叛乱，故而被封为赵氏。另有居住在犬丘的秦人，因善于养马，保西垂有功，被周孝王赐姓为嬴，这是秦部落又一次被赐为嬴姓。及至始皇帝扫平六国，定国号为秦，这个名称便成为当今陕西省的古代称谓中沿用时间最长的一个。“项籍灭秦，分其地为三：以章邯为雍王，都废丘；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董翳为翟王，都高奴，谓之三秦。”^④

三秦大地，依据山川地貌今人将其划分为陕北、关中、陕南三大块

①（元）骆天驥：《类编长安志》，黄永年点校，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②（汉）无名氏：《三辅黄图校注》，何清谷校注，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③（汉）司马迁：《史记·老子伯夷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7页。

④（汉）无名氏：《三辅黄图校注》，何清谷校注，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带。秦岭山脉以南为陕南，境内有黄河和长江两大水系，而绝大多数河流属于长江水系，汉江是其主要的支流。这条发源于秦岭山中，一路流经汉中、安康、十堰、襄阳、汉口等中小城市以及几十个县城的河流，全长一千五百多公里，在武汉的龙王庙汇入长江，流进大海。十堰市以上的河段，是在秦岭和巴山间的峡谷中穿行。这里山林苍茫、云雾密布、雨量充沛，衍生出千百条大小河流与溪沟，构成了陕南密集的水道。陕南特有的地理特征使这个地域以种植水稻为主，气候、物产、风俗与我国南方相似。明清之际，曾有大量移民从湖北、湖南等地迁入陕南，这些移民将一些楚国风俗带到了陕南，造成了这里浓郁的南方文化气息。陕西北部为黄土高原地带。这里是中国黄土沉积最厚的地方，主要地貌为黄土塬和黄土丘陵，黄土塬是黄土堆积的高原面，地势平坦，地面倾斜度达不到1度，只有在边缘才可看见比较明显的斜坡。黄土丘陵按形态可分为两种，长条形的叫做“梁”，椭圆形或圆形的称为“峁”。由于水土流失严重，陕北黄土高原上的大部分梁、峁非常破碎，沟谷分布的密度很大，可谓沟壑遍布。中部为关中平原，自然条件最为优越。称“关中”，据说与这个地域古时设置的关隘有很大的关系。然而，在古时，关中到底有哪些关隘可以作为界定“关中”概念的依据，现已无法考辨。据潘岳的《关中记》载：“秦，西以陇关为限，东以函谷为界，二关之间，是谓关中之地。东西方千余里。南北近山者相去一二百里，远者三四百里。南山自华岳，西连秦岭终南、太白，至于陇山。北有高陵平原，南北数千里，东西二三百里，西接岐、梁、汧、雍之山。关中有泾、渭、灞、泾、沔、沔、漓、漓之水。”^①而今天的关中，则专指西至陕西宝鸡的大散关、东至河南灵宝的函谷关，北至黄土高原南缘，南至秦岭北麓的渭河平原。自古关中金城千里，是谓天府之国、陆海之地，故号称八百里秦川。以西安为界，咸阳、兴平、武功、周至、凤翔、长武、岐山、宝鸡，两个专区几十个县为西府；三原、泾阳、高陵、户县、合阳、大荔、韩城、白水，一个专区十几个县为东府。

江山胜迹，以及由此滋生的风土民俗、气韵精神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① 刘庆柱辑注：《三秦记辑注·关中记辑注》，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有极大的影响。魏晋人说“秦筝发西气，齐瑟扬东讴”，唐文里也生发出“西北之音慷慨，东南之音柔婉，盖昔人所谓系水土之风气”的喟叹。历来文人总是最为敏感的人群之一，“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亦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① 故此，汉代司马迁之文奇雄健绝，大概缘于“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峰。扞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② 可见，司马迁能尽天下之大观，以助其气，然后吐而为辞，笔而为书，此乃为江山之助也！

陕西虽然按照自然地理状况划分为三大地域，但是历史上出现文人群基本上都是在关中地区。汉初，随着政局的稳定，齐、楚贵族，新朝功臣后裔以及各地移民逐渐汇集到三辅地区，形成了三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的文化特征，也由此诞生了三辅文人群。《史记·货殖列传》载：“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畜、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此其章章尤异者也。”^③ 可见，当时王公世家，商贾富人，招集门客已成世风。而一些文化世家则以聚徒讲学的方式汇集各地文人，出现了安陵班氏、茂陵马氏、平陵窦氏、弘农华阴杨氏这些当时最显赫的文化世家。安陵班氏以班彪、班超、班固取得成就最大，茂陵马氏，其先祖赵奢为赵将，号曰马服君，子孙因以为姓氏。两汉之际，马援颇有文名，他的四个儿子马廖、马防、马光、马客卿均为当时名士。这个家族中最有名望的是马融。他编注了《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离骚》等，又著有赋、颂、碑、诔、书、表、奏、七言、琴歌、对策凡二十一篇。平陵窦氏发迹于窦融，窦融之后曾孙窦章，有文名。窦章女年十二，能属文，以才貌选入掖庭。窦融玄孙窦武，以经行著称，常教授于大泽中，名显关西。弘农华阴杨氏则为最显赫的文化世家，杨敞是昭帝时丞相，封安平侯，其子杨震少好学，明经博览，无不穷究，人称

①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94页。

② （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482页。

③ （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474页。

“关西孔子”，其玄孙杨修则完全以文学才能著称于世，著有赋、颂、碑、赞、诗、哀辞、表、记、书凡十五篇。唐代关中出现了文学士族，名作荟萃，在整个唐代文学创作队伍中可谓一支生力军。韦氏家族中的韦述、韦承庆、韦嗣立、韦济、裴迪较为有名，中唐时白氏家族里的白居易、白行简、白敏中亦影响广远。然而，这些都是以家族的形式出现的文人群体，文人群体打破宗族限制，走向以地域条件来划分大概是到了宋代。因为此时，就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学来讲，逐渐摆脱了诠释“主权”合法性的窠臼，书院的出现，为士人讲学、研究学问提供了场所，也为社会培养出了大批人才。

由于儒教向地域化方向的发展，分化出濂、洛、关、闽、粤学派，因而，文化群体逐渐呈现以地域为单位存在的文人群落。群落本是一个生物学上的概念，原指生存在一起并与一定的生存条件相适应的生物的总体，是同类事物聚集而成的群体。“地域文化群落”（Culture Community）是以地域为中心，围绕着区域而形成的文人群落，这些文人之间关系松散，但是受本土文化的熏陶，逐渐形成了错落有致、地域文化色彩浓郁的创作风格。到了清时，中国的文化群体主要集中在东南一带，江浙皖是一个非常大的学术区域，自从昆山顾亭林开吴学门派以来，逐渐衍化为程朱、陆王、掌故、经学、西学、校刻书六派，原来被视为文化沙漠的广东、湖南也是人才辈出，先后出现了湖湘文人群、江浙文人群和闽南文人群。这些文人群落是中国最早接触西方文化，对外来冲击能够积极做出回应的知识群体。而这个时候的西部地区文化群落发展比较微弱，在陕西曾经出现了一个“三秦诗派”，清王鸣盛云：“三秦诗派，本朝称盛，如李天生、王幼华、王山史、孙豹人，盖未易更仆数矣。予宦游南北，于洮阳得吴子信辰诗，叹其绝伦。归田后复得刘子源深诗，益知三秦诗派之盛也。”^①然而与东南沿海文人群落相比，“三秦诗派”毕竟影响小，规模不甚大，陕西形成真正有影响的文化群落则是20世纪后期的事情。

20世纪40年代，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文化中心开始从城市向乡村转移，新中国成立之后，陕西、山西、河北等地很快成为作家

^①（清）王鸣盛：《刘戒亭诗序》，吴镇：《松花庵全集·诗草》，宣统二年重梓本。

群诞生的地域。曾经在延安的柯仲平、马健翎、柳青、杜鹏程、王汶石、胡征、李若冰、魏钢焰、戈壁舟等作家大部分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陕西文学的主力。1954年新华社随军记者杜鹏程出版了《保卫延安》，在全国引起轰动，接着柳青发表了《创业史》，展示了如火如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还有王汶石的关中农村系列作品，李若冰的《柴达木手记》，王宗元创作的电影剧本《智取华山》和小说《惠嫂》，在全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代作家都具有延安生活和革命经历，进入新中国之后迅速地成长起来，自然是当代陕西第一代作家创作群体。然而，“这一批人很不幸，碰到运动。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前）对作家抓得很紧，一些重要会议、活动都要参加，因此创作十分辛苦，还有各种要求。这一批人在革命队伍长大，创作要配合路线方针，所以他们的创作有特殊性，创造很不容易，有时代的局限性，比如合作化运动对他们的影响。但是，他们还是做出了成绩，在全国很突出。在这一代人身上有一种努力探索的精神，能够长期和群众在一起。像柳青在农村蹲点，老杜从部队转到铁路工地，这些对他们来讲都很有意义。就拿老杜讲，《保卫延安》是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批人中最早拿出来的大作品，有重大突破，国内确实没有，……在此之前，关于共产党军队到底是什么样子，没有人知道。老杜将这种生活和我们的军队展现出来了。作品描写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是人们的精神很乐观，鼓舞人，创造出来的英雄形象也完全是战士。当时国家不像旧社会那个样子，社会号召英雄，需要英雄，部队也提倡英雄，这有利于群众接受新社会。全国人民对新社会寄托着希望，所以《保卫延安》发表了以后，几乎全国人手一册。傅雷给儿子的信中也提到了《保卫延安》。”^①老作家问彬所讲的这一席话，代表着对陕西第一代作家群的总体评判。确实，这一代作家写革命战争题材的作品充满政治意识；同时他们又深入生活，深刻体验群众感受，作品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再加之写自己熟悉的土地，兼具地域文化色彩。杜鹏程《保卫延安》里对沙漠、高原等自然环境的描摹，王汶石文本充盈的渭北平原乡村文化味道，柳青《创业史》包含的丰富的关

^① 2012年7月笔者访谈杜鹏程的爱人张文彬（笔名问彬），此处文字是根据其讲述略作调整整理而成，未经本人审阅。

中民俗、方言等文化特色，皆能使我们感受到秦地传统文化的神韵。

新时期以来，一大批年轻的陕西作家跃上文坛。莫伸的《窗口》、贾平凹的《满月儿》先后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不久路遥的《人生》也获奖了，并因为塑造了高加林这一城乡交叉地带的青年农民形象而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另有陈忠实的《初夏》也获得了奖项。那个时候《延河》是陕西作家发表作品的重要阵地，“笔耕组”对陕西作家的成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91年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获得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这表明陕西文学创作已经从中短篇小说逐步到长篇小说的创作阶段。尤其是1993年，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程海的《热爱生命》，京夫的《八里情仇》，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集结在北京出版，这便是文坛盛传的“陕军东征”事件。此时莫伸的长篇报告文学《天下第一路》在工人出版社付梓。这些作家的作品浸透着陕西境内三大地域的不同文化色彩，在全国范围内都堪称翘楚。90年代后期，陕西文坛又有红柯、叶广芩、杨争光、冯积岐、冷梦、朱鸿、寇挥等作家涌现出来，他们或将自己的创作视野投向新疆等边远之地，或在京味与秦腔之间徘徊，或行吟在山水与历史之间，或表现出强烈的艺术创新倾向，或开始转向影视合作。不言而喻，90年代以后的陕西文坛出现多元化的趋势。红柯的《西去的骑手》和《美丽奴羊》透现出强烈的现代意味和多元文化杂糅的特征，营造出一种超现实的梦幻诗意。冷梦的作品在炽烈的情感和大气之中，透显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之情，晚近问世的《西榴城》充满魔幻现实主义意味。因此，这一代作家不仅是一个多样化的群体，而且价值取向也呈现多元化特征。他们的创作方法既有现实主义色彩，又兼具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特色。但是在多元中仍可辨认出陕西地域的文化特征，冯积岐的作品是典型的关中文化文本，《村子》既有柳青《创业史》的痕迹，也有陈忠实《白鹿原》的一些味道。红柯是在关中文化与草原文明对照之间寻找创作视点。叶广芩在京味与秦风之间蹀躞。朱鸿这位少陵原上走出的作家，热衷于周秦汉唐文化。贾平凹则是中国当代文坛上的独行侠，他在90年代之后的一些创作散发着商业文化的气息。他在陕西就有三个文学馆，他的书画成为文化商品，2010年新出版的《贾平凹文集》卖到了天价，这些都充分说明贾氏已然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